

我国参与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汪利钊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文章采用一般均衡研究方法,通过构建一个参与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型,从反面证明了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低效的基本事实,而且在迁移成本很小或可忽略不计的假设下,居民会通过“用脚投票”自行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文章还使用上海某区4个街道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拉丁方方差分析法检验理论模型的结论,检验结果支持理论模型的结论。文章最后根据我国国情给出提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参与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用脚投票

中图分类号:F062.6;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5-0015-1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如何向国民提供公共服务,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公共服务理论依据(贾康和阎坤,2005)、公共服务指标体系(陈昌盛,2007;郭宏宝,2008)、财政制度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王家永,2008)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樊丽明,2009;王谦,2008)等方面进行论述。关于公共服务的理论依据于树一(2007)主要引用庇古《福利经济学》两个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也即通过对这两个命题的释义来奠定我国公共服务研究的理论基础。现有研究均认为,福利经济学以寻求“最大化的社会经济福利”为目标,解答资源如何进行配置以提高效率、收入分配如何实现以及集体如何进行选择以增进社会经济福利这三个问题。回答第一个命题是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回答第二个命题是对后两个问题的解答。第二个命题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国民收入分配如何均等化?这可以通过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给穷人使社会总体满足程度增大。那么如何将富人的货币收入转移给穷人呢,这就需要集体选择来解决。正如 key(1940)所说:“将 X 美元分配给行为 A 而不是行为 B 的标准是什么”,本文认为这个标准应该是由不同偏好的国民组成的各个利益团体共同博弈的结果,因此此标准是不同国民偏好

收稿日期:2011-01-28

作者简介:汪利钊(1977—),男,安徽巢湖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的函数。当这个标准被政府实施,即将 X 美元分配给行为人 A 而不是行为人 B 时,社会经济福利将实现最大化,因为行为人 A 增加的社会经济福利大于行为人 B 减少的额度,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经济福利是增加的。由此,在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和收入实现合理分配下,通过集体选择实现了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这也顺利完成了庇古提出的两个命题。

但是本文认为庇古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国民能通过一定的公共选择过程来表达偏好。因为现实中很多国家都不满足此条件。那么政府如何向国民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 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公共服务供给角度出发,认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特别是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即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安体富,2007、2008)。王彩泽(2007)等则认为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应实现财政均等化,只有先实现财政均等化才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王莹,2008; 龚金保,2007)。我国政府在向国民提供公共服务时,由于没有如国外的集体选择过程,在不知晓国民偏好的情况下向国民提供偏好一致的公共品是否有效率? 国民将做出怎样的对策?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本文的主要内容。

二、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将中国教育与卫生保健财政支出的各项指标与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相比较发现:(1)我国教育支出投入严重不足且存在结构失衡。我国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2.8%,不仅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甚至还达不到低收入国家 3.7% 的平均水平。在总量不足的情况下,教育支出的结构也存在严重失衡。我国每个大学生的公共支出占人均 GDP 的百分比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13.5 个百分点,而每个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公共支出占比却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不及低收入国家,基础教育的每个小学生的公共支出占比与低收入国家还相差近 4 个百分点。这明显有悖于教育支出结构分配的基本理念。

(2)我国卫生保健支出较低。卫生保健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2.0%,比下中等收入国家低 0.5 个百分点,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近 4 个百分点。卫生保健财政支出占有卫生保健支出的比例更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 24.2 个百分点。人均卫生保健财政支出也没有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由于从财政视角考察我国公共服务支出不足的缘由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所以本文将视角转向公共服务的需求者探究我国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缘由。

要探究不足的缘由,首先应从公共财政本身的要义开始。公共财政是各级政府按照本辖区的偏好对本辖区的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其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负责、灵敏和有效地对本地区居民的偏好做出反应,这在本质上是辖

区内的公共治理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既不能离开通过立法确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方面的分权,也不能离开一定的地方居民参与。通过辖区居民参与,将地方居民的不同偏好如实加以反映和整合,使政府决策按照这些偏好而设计并使本地的公共决策对上级政府存在足够的自治空间。在这一参与机制下,充足预算安排和预算结构优化得以保证,各利益阶层通过表达其偏好,最终获得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在有限的辖区内,这样的参与机制既可以定期无记名选举和辩论,也可以咨询听证,同时结合明确的上下级政府分权。不论何种类型,这一机制是现代公共财政所必需的。

我国属于转型经济国家,30年来我们主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发展导向,举国上下以发展经济为主线。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主要为发展经济而设计,理论上把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和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两者的比值取决于这两项支出的产出弹性,这意味着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有关(郭庆旺、吕冰洋和张德勇,2003)。那么二者呈现怎样的关系,经验研究表明GDP的实际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性支出比率显著负相关,而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Grier和Tullock,1989),这从经验角度证明了财政支出结构中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此外,Aschauer(1989)强调要区分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资本积累(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作用,他的经验分析表明政府资本存量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正效应,但是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小得多;Barro(1991)明确区分了财政支出中的非生产性政府消费和生产性公共投资,其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消费对人均GDP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公共投资对人均GDP有正向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

经验证据支持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是有影响的,而且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这正好与我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客观事实相吻合。当然,这样的财政支出结构还要置于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来考察才能更清晰地解释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模式缺陷。我国自上而下的政治集权和人事体制使得我国的“分权”安排属于集权下的“放权”和随时可由政府自由裁量权变更的分权,加之民主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各个地方政府不是对辖区民众负责的内部责任政府而是主要对上级负责的外部责任政府。然而这种外部责任又不是完全责任,因为分权的客观存在和上下级政府间由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规则约束总的来说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官员的行为往往以自利为取向,其目标是控制更大的经济规模,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这基本符合尼斯卡南模型的预算最大化官僚假设(Niskanen,1971),在此基础上,官员不仅可以实现自身财政控制能力最大化,还可以实现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晋升机会最大化。

中国官员任命制下垂直的官员“经济挂帅”,官员晋升考核指标被物化为

“地方 GDP 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额、招商引资数量等”,从而激励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地方官员在此激励下的唯一目标是保证投资增长、GDP 增长和税收收入增长。能保证这些增长的所有要素都是财政支出对象,特别是那些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增长的要素更是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对象,而公共服务不能“立竿见影”地达到上述目标,对它的投入既不能直接拉动 GDP 和税收的增长,又凸显不了本届政府任期内的政绩。与此同时,各地各级政府之间还存在较严重的税收竞争,使得我国呈现变相的“财政降格”,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海外资本而为其提供有足够诱惑力的税率优惠和减免,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不惜以财政补贴来吸引投资,这样必然导致各地方各级政府向其辖区内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减少。

因此,无论从国家层面公共服务供给的公民参与还是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居民参与来说,均呈现严重不足。居民参与国家层面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造成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总量无论相对国内其他财政支出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显不足。居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得不到辖区内居民的认可。定性论证能否得到理论支持,我们将使用经典的经济学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三、参与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型

我们考察在一个国家里存在两个居民,他们消费两种公共品。为此他们需要分别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缴纳中央税和地方税,居民可以在两个地方政府之间选择缴纳地方税,且居民在移居另外一个辖区前,会考虑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当其获得的边际效用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时,他(她)才会移入该辖区,反之则反是。居民 $h(h=1,2)$ 的效用函数为 $u^h(x_{h1}, x_{h2}, z_h)$, 其中, x_{hi} 是居民 h 对公共品 i 的消费量, z_h 是居民 h 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缴纳的中央税和地方税,且 $u_1^h(x_{h1}, x_{h2}, z_h) \neq u_2^h(x_{h1}, x_{h2}, z_h)$ 。居民的初始要素禀赋为 $\bar{z}_h$ 。假设居民对公共品的偏好满足不饱和性,那么居民 h 对公共品 i 的边际效用 u_i^h 始终为正,即 $u_i^h > 0 (i, h=1, 2)$, 且居民对税金的边际效用始终为负,即 $u_z^h < 0$ 。

地方政府 i 根据生产函数生产所有的公共品 i , 产量为 x_i :

$$x_i = f^i(z_{i1}, z_{i2}), i=1, 2 \quad (1)$$

其中, z_{ih} 是生产公共品 i 的投入税金额(由居民 h 提供), 且居民 h 向政府提供税金的公共品边际产量为正, 即 $f_h^i = \partial f^i / \partial z_{ih} > 0 (i, h=1, 2)$ 。

居民对公共品 i 的需求量不可能超过地方政府 i 的产量, 居民 h 投入的税金额也不可能超过居民的纳税额, 也即:

$$x_i \geq \sum_{h=1}^2 x_{hi}, i=1, 2 \quad (2)$$

$$z_h \geq \sum_{i=1}^2 z_{ih}, h=1,2 \quad (3)$$

由(2)式和(3)式可见,税金 z_{ih} 将随着公共品产量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居民的消费量也随之增加,其效用也增加。同时,为了满足配置可行,假设居民 h 的投入小于或等于其所拥有的初始禀赋:

$$\bar{z}_{ih} \geq z_{ih} \quad (4)$$

此时我们需要在两个居民同时消费两种公共品、投入两种税(中央税和地方税)及两个地方政府同时使用这两种税向本地居民提供本地公共品和具有一定外溢性公共品的条件下,寻找无拐点的帕累托有效配置。为此,只需要在保持居民 2 效用不变的条件下,寻找使得居民 1 效用最大化的配置条件:

$$\max_{x_{11}, z_{11}, x_{12}, z_{12}} u^1(x_{11}, x_{12}, z_1) \quad \text{s.t.} \quad u^2(x_{21}, x_{22}, z_2) \geq \bar{u}^2 \quad (5)$$

约束条件为(1)式、(2)式和(3)式。

帕累托有效配置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L = u^1(x_{11}, x_{12}, z_1) + \lambda [u^2(x_{21}, x_{22}, z_2) - \bar{u}^2] + \sum_i \rho_i (x_i - \sum_h x_{hi}) + \sum_h t_h (z_h - \sum_i z_{ih}) + \sum_i \mu_i [f^i(z_{i1}, z_{i2}) - x_i] \quad (6)$$

其中, λ, ρ_i, t_h 和 μ_i 分别为(5)式、(2)式、(3)式和(1)式约束方程的拉格朗日乘子。

一阶条件为:

$$\partial L / \partial x_{1i} = u_i^1 - \rho_i = 0, i=1,2 \quad (7)$$

$$\partial L / \partial x_{2i} = \lambda u_i^2 - \rho_i = 0, i=1,2 \quad (8)$$

$$\partial L / \partial z_1 = u_z^1 + t_1 = 0 (u_z^1 \text{ 为居民 1 缴税 } z_1 \text{ 后所获得的效用}) \quad (9)$$

$$\partial L / \partial z_2 = \lambda u_z^2 + t_2 = 0 (u_z^2 \text{ 为居民 2 缴税 } z_2 \text{ 后所获得的效用}) \quad (10)$$

$$\partial L / \partial z_{ih} = \mu_i f_{ih}^i - t_h = 0, i, h=1,2 \quad (11)$$

$$\partial L / \partial x_i = \rho_i - \mu_i = 0, i=1,2 \quad (12)$$

(一)消费帕累托有效均衡。整理(7)式和(8)式得:

$$MRS_{21}^1 = u_1^1 / u_2^1 = \rho_1 / \rho_2 = u_1^2 / u_2^2 = MRS_{21}^2 \quad (13)$$

在总产出给定条件下,两个居民之间有效配置满足两种公共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 MRS_{21}^h 等于两个消费者所获消费束的比率。

假设中央政府认为两个居民对公共品 1 的偏好相同,则无差别地向两个居民提供公共品 1(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此有:

$$u_1^1 / u_1^2 \quad (14)$$

将(13)式变换为:

$$MRS_{21}^1 = u_1^1 / u_1^2 = \rho_1 / \rho_2 = u_2^1 / u_2^2 = MRS_{21}^2 \quad (13a)$$

由(14)式代入(13)式得:

$$MRS_{21}^1 = MRS_{21}^2 = 1 \quad (15)$$

将(15)式代入(13)式可得:

$$u_1^1 = u_2^1, u_1^2 = u_2^2 \quad (16)$$

这显然与前提假设 $u_1^h(x_{h1}, x_{h2}, z_h) \neq u_2^h(x_{h1}, x_{h2}, z_h)$ 相悖, 否则会导致居民在消费两种不同公共品时得到相同效用。我们将此结论推演至一般化将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即所有居民对不同公共品具有相同偏好,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Arrow, 1963)。因此在 $u_1^1 = u_2^1$ 假设条件下, 中央政府向居民无差别地提供公共品将会导致(13)式不成立, 导致地方政府公共品提供的低效率配置。

(二)产出与交换有效配置均衡。在连续向政府缴税条件下, 根据(10)式、(11)式和(12)式整理可得有效产出公共品组合的必要条件是:

$$MRT_{21} = f_1^1/f_1^2 = f_2^1/f_2^2 = \rho_1/\rho_2 = u_2^1/u_2^2 = u_1^1/u_1^2 = MRS_{21} \quad (17)$$

其中, $f_1^2/f_1^1 = f_2^2/f_2^1$ 是居民将地方税缴纳给地方政府公共品 1 和公共品 2 的边际产量之比。这个比值是两种商品的边际交换率, 即在总税额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居民 1 从地方政府 2 迁移到地方政府 1 后, 公共品 2 产量的减少与公共品 1 产量的增加之比。这意味着公共品 1 增加 1 单位需要有 $1/f_1^1$ 的税源(居民 1)从地方政府 2 迁移到地方政府 1。这样地方政府 2 的公共品产量减少量为公共品 1 的边际产量乘以 z_{21} 的减少量, 即 $f_1^2(1/f_1^1)$ 。同样, $f_2^2/f_2^1 = f_1^2/f_1^1$ 也是居民 2 从地方政府 2 辖区迁移到地方政府 1 辖区后, 公共品 2 产量的减少与公共品 1 产量的增加之比。见图 1。

假定居民向地方政府缴纳税收是有效率的, 整个社会位于曲线 PP 上, 如点 A^0 。产出的埃奇沃斯盒状图的原点为点 O 和点 A^0 。假设在点 a^0 上, 公共品在居民之间分配是有效率的, 那么 a^0 位于无差异曲线切点的轨迹 C^0 上。假设无差异曲线在点 a^0 的斜率与生产可能性曲线在点 A^0 的斜率不同, 这意味着不满足(17)式。由图 1 知, 无差异曲线在 a^0 的斜率大于曲线 PP 在 A^0 的斜率。因此这不是居民消费公共品的最优配置, 居民会通过“用脚投票”不断进行“试错性”迁移。假设迁移成本很小或可以忽略不计。为了说明居民 1 在迁移过程中其自身的配置是否得到改进, 我们假设居民 1 从地方政府 1 辖区内迁移到地方政府 2 辖区内, 图 1 的移动轨迹是 $a^0 \rightarrow a^1$ 。由于假设居民 2 效用保持不变, 在图 1 上表现为 a^0 到 A^0 的距离等于 a^1 到 A^1 的距离, 当居民 1 将地方税由原来缴纳给地方政府 1 改变为缴纳给地方政府 2 时, 整个社会公共品产量发生了改变。以点 O 为原点, 居民在 a^1 的效用要比在 a^0 的效用大, 因为 a^1 所在的无差异曲线比 a^0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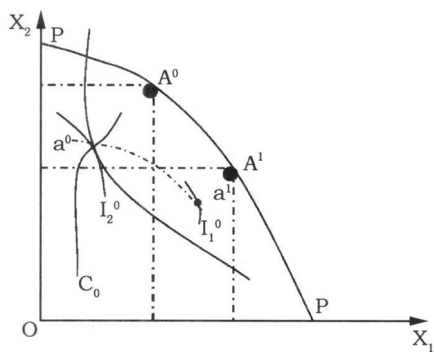


图 1 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最优配置, 居民会通过“用脚投票”不断进行“试错性”迁移。假设迁移成本很小或可以忽略不计。为了说明居民 1 在迁移过程中其自身的配置是否得到改进, 我们假设居民 1 从地方政府 1 辖区内迁移到地方政府 2 辖区内, 图 1 的移动轨迹是 $a^0 \rightarrow a^1$ 。由于假设居民 2 效用保持不变, 在图 1 上表现为 a^0 到 A^0 的距离等于 a^1 到 A^1 的距离, 当居民 1 将地方税由原来缴纳给地方政府 1 改变为缴纳给地方政府 2 时, 整个社会公共品产量发生了改变。以点 O 为原点, 居民在 a^1 的效用要比在 a^0 的效用大, 因为 a^1 所在的无差异曲线比 a^0 所

在的无差异曲线高。因此从 (A^0, a^0) 到 (A^1, a^1) 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而最初的配置 (A^0, a^0) 不是帕累托有效配置。

四、来自问卷调查的经验证据

我们采用实验经济学中拉丁方方差分析法检验上述模型结论,为此我们对上海某区进行了问卷调查。该区共有 5 个街道,我们任意选取了 4 个街道。按照居民对参与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了解程度将居民分为 4 种,同时将街道公共服务供给参与程度分为 4 种,由 1 到 4 依次递增。在每个街道发放 100 份调查问卷,共 400 份问卷,收回 256 份问卷。在问卷中我们给出了偏好教育(A)、偏好医疗卫生(B)、偏好社会保障(C)和偏好环境保护(D)四个选项,居民可以根据自己偏好任选一种公共服务供给项目。该区政府主要关心街道公共服务供给参与程度与居民迁入率的关系,检验零假设为在居民存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偏好下居民参与街道公共服务供给程度对居民迁入率无显著影响。

表 1 街道公共服务供给参与程度拉丁方安排实验问卷结果

参与度/了解度	了解程度 1	了解程度 2	了解程度 3	了解程度 4
参与程度 1	C ₁₃	A ₁₂	B ₁₆	D ₁₆
参与程度 2	B ₁₂	D ₁₀	C ₁₃	A ₁₃
参与程度 3	A ₁₇	B ₂₁	D ₁₆	C ₂₀
参与程度 4	D ₁₈	C ₂₁	A ₁₆	B ₂₂

表 1 中的数值表示在某种偏好下居民愿意迁入某种参与程度街道的人数百分比,如 C₁₃说明 100 个居民中了解程度 1 的 13 个居民因偏好社会保障而选择迁入参与程度为 1 的街道。根据拉丁方分析法我们设定一个线性模型并对其进行方差分析,该模型为:

$$y_{ijt} = \eta + \beta_i + \gamma_j + \tau_t + \epsilon_{ijt} \tag{18}$$

其中, y_{ijt} 为问卷的迁入率, η 为迁入率的均值, β_i 为被拉丁方各行(了解程度)所控制的因素对迁入率的影响, γ_j 为被拉丁方各列(参与程度)所控制的因素对迁入率的影响, τ_t 为居民的教育(A)、医疗卫生(B)、社会保障(C)和环境保护(D)偏好对迁入率的影响, ϵ_{ijt} 为均值为零的随机误差向量。

拉丁方方差分析是
将上述模型 γ_j 和 τ_t 对迁入率的影响与 β_i 对迁入率的影响剥离开。表 2 中我们将总平方和分解为与参与程度、了解程度和居民偏好对应的平方和以及残差平方和。

表 2 拉丁方方差分析表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行	$k \sum_{\text{rows}} (\bar{y}_{\text{row}i} - \bar{y})^2$	$k-1$
列	$k \sum_{\text{cols}} (\bar{y}_{\text{col}j} - \bar{y})^2$	$k-1$
偏好	$k \sum_{\text{treatments}} (\bar{y}_{\text{treatment}s} - \bar{y})^2$	$k-1$
残差	$\sum_i \sum_j \sum_t (y_{ijt} - \bar{y}_i - \bar{y}_j - \bar{y}_t + 2\bar{y})$	$(k-1)(k-2)$
总残差	$k \sum_{\text{cols}} (\bar{y}_{\text{row}i} - \bar{y})^2$	k^2

$K \times K$ 阶拉丁方的总残差平方为拉丁方中所有观察值与总均值 $\bar{y}$ 之差的平方和。 $K \times K$ 阶拉丁方共有 k^2 个观察值,总残差平方和的自由度为 $k^2 - 1$ 。拉丁方的总残差平方和可被分解为行平方和、列平方和、参与程度平方和以及残差平方和。行平方和对应的是被拉丁方各行所控制的因素对观察值的影响,其影响效果表现在各行的均值 $\bar{y}_{\text{row}i}$ 与总均值 $\bar{y}$ 之差。行平方和为对参与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了解程度影响下的迁入率与所有变量影响下的迁入率总均值之差的平方和。列平方和对应的是被拉丁方各列所控制的因素对观察值的影响,其影响效果表现在各列的均值 $\bar{y}_{\text{col}j}$ 与总均值之差。列平方和为参与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参与程度影响下的迁入率与所有变量影响下的迁入率总均值之差的平方和。参与程度平方和所对应的是参与程度对迁入率的影响,其影响效果表现在各种参与程度下的均值 $\bar{y}_{\text{treatments}}$ 与总均值之差。偏好平方和为各种公共服务供给参与程度下的迁入率与 4 种参与程度下迁入率均值之差的平方和。总残差平方和对应于其他不能被解释的部分。本文运用 matlab7.0 对上述数据残差进行运算,结果见表 3。

表 3 F 检验统计值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均方差的期望值	各均方差与残差均方差之比
了解程度	18.5	3	6.17	$\sigma^2 + k \sum \beta_i / (k-1)$	$F(3,6)=2.96$
参与程度	143.5	3	47.83	$\sigma^2 + k \sum \gamma_i / (k-1)$	$F(3,6)=22.96$
偏好	27.5	3	9.17	$\sigma^2 + k \sum \gamma_i / (k-1)$	$F(3,6)=4.4$
残差	12.5	6	2.08	σ^2	
总残差	202	15			

表 3 中各均方差与残差均方差之比表明了解程度和偏好均不能拒绝零假设,这意味着对是否用脚投票来迁入该街道,了解程度和偏好不是最主要考虑的因素。只有参与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水平 5% 的临界值(4.76)检验,即拒绝了公共服务供给参与程度对迁入率无显著影响的零假设。这说明居民对公共服务供给能否参与作为是否迁入该街道的一个主要变量。同时我们从表 1 可知,参与程度最高的居民愿意迁入率是最高的,这也说明了随着公共服务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居民会不断迁入以提高自己的公共服务效用。只有当其获得的边际效用小于或等于边际成本时,居民才停止迁入该街道。

五、对策建议

居民是公共服务的消费主体且呈现出对公共服务供给的量、质以及层次的不同要求,所以改变现有单一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实施参与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提升我国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一种重要途径。

对全国性公共品,主要可以在国家层面上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无行政职务人大代表的席位,通过无行政职务的基层公民参与制定下一年度公共预

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层公民对全国性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通过增加上述席位揭示居民偏好,在我国不会出现 Samuelson(1954)揭示的“偏好显示问题难以实现”的现象,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Samuelson 认为,居民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决定公共品的供给量、层次、水平和范围,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是不可能满足的。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居民不参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事务,因此居民仅仅是公共品的被动接受者。如果一项公共品供给已经确定但在具体数量、质量、层次和范围上尚未确定,对居民而言,显示其偏好是最优的决策,如果不显示其偏好,反而得不偿失。因此当无行政职务居民担任人大代表时,他(她)会显示其代表的那个阶层居民的偏好,从而优化我国公共品提供的效率和质量。

对地方性公共品,地方政府也应该按照上述方法改革地方人大,使得辖区内居民能参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从而反映辖区内居民偏好。此外,政府应提高居民资本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逐渐实现依靠资本收入生活,从而使得各地居民能不受工作地点的限制;政府还应降低阻碍居民地区间流动的迁移成本和交通成本,减少各地区间公共服务和税收的外溢。在此条件下当居民能在众多的地方政府间选择时,他们也可以“用脚投票”(Tiebout, 1956)来甄别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具体到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量和结构时,政府应该建立一套前期调研和后期评价体系,以便下次进行微量调增或调减,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优化公共服务结构。既不是仅仅使用好看不中用的 Clarke-Groves 机制(Groves, 1977; Clarke, 1971)从需求角度间接揭示居民对公共品的消费偏好,也不是仅仅采用条件苛刻的“用脚投票”配置公共品资源,而是这两者的结合。通过设计问卷调查,要求公共物品消费的居民对研究人员描述的某种假设事件做出可能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政府向本地区居民提供公共品,同时评价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和质量;如果没有达到上述要求,则要探求原因,使得下一次公共品供给能实现帕累托改进。

* 本文受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CXJJ-2010-310)的资助。感谢刘小川教授、王晓丹和陈烨博士以及匿名评审专家给予的有益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 [1]安体富,任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问题与对策[J].财贸经济,2007,(8):48—53.
- [2]安体富,任强.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地区差别视角的量化分析[J].财贸经济,2008,(6):79—83.
- [3]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基本价值取向与综合绩效评估[J].财政研究,2007,(6):20—24.
- [4]樊丽明,石绍宾.区域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及实现机制分析——基于山东省6市3区县调查的经济学思考[J].财政研究,2009,(4):31—34.

- [5]郭宏宝.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评价与实际应用[J].当代财经,2008,(3):29—33.
- [6]龚金保.需求层次理论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顺序[J].财政研究,2007,(10):33—35.
- [7]贾康,阎坤.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中长期思考[J].管理世界,2005,(8):33—37.
- [8]王家永.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责任与对策[J].财政研究,2008,(8):64—66.
- [9]王莹.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制度设计要素的思考[J].财贸经济,2009,(2):30—34.
- [10]王泽彩.财政均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探索[J].财政研究,2007,(1):25—28.
- [11]王谦.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8):12—17.
- [12]杜宁华.实验经济学教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 [13]Aschauer D. Is public spending productiv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23: 177—200.
- [14]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S103—S125.
- [15]Devvarajan S, Swaroop V, Zou H.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37: 313—344.
- [16]Grier K, Tullock 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1951—1980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24: 259—276.

Research on Participatory Mode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in China: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WANG Li-tan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articipatory model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by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confirms the low efficiency of current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mode in China.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igration cost is very small or could be neglected, the inhabitants automatically allocate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through voting with their fee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of 4 streets in Shanghai, it confirm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by Latin square analysis of variance.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in China.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mode; voting with their feet

(责任编辑 许 柏)